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6.3

一年出版4期，以16种语言刊出

印度自我交战的民主

Nandini Sundar

土耳其威權主義

Cihan Tugal

巴西卢拉主义的终结

Ruy Braga

新自由主义阿根廷
的劳动政治

Rodolfo Elbert

美国右翼的故事

Arlie Hochschild

大学和社会学

- > 英国企业大学的兴起
- > 加拿大的社会学战争

纪念

- > John Urry, 1946-2016

特辑

- > 反对性暴力的学生运动
- > Mondragon的第三条路
- > 罗马尼亚的编辑团队

MAGAZ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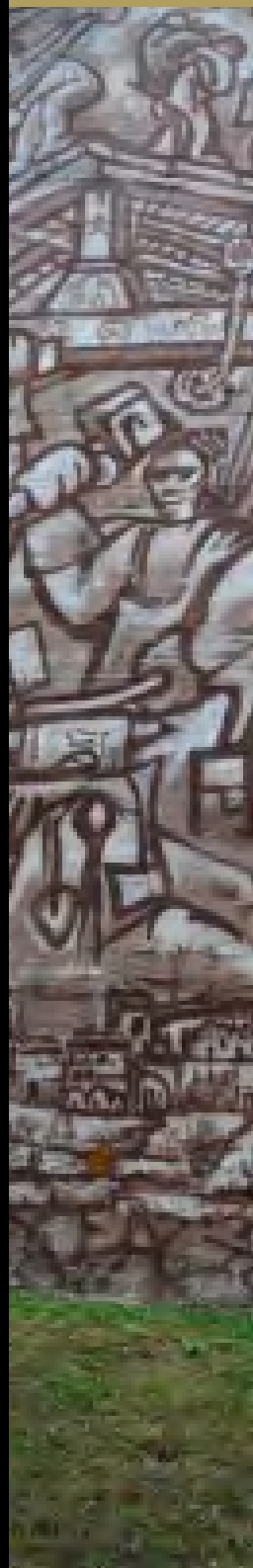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6卷 / 第3期 / 2016.9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编的话

21世纪的民粹主义

在 2011 年和 2014 年之间,《全球对话》对于震惊世界的社会运动相当乐观—阿拉伯之春,占领运动,Indignados,劳工运动,学生运动,环境运动,反对农村迫迁运动等等。我们的乐观主义没有持续太久,因为这些运动也带来了一连串的反动民粹运动以及威权的兴起。这期我们探讨的右翼的兴起,Arlie Hochschild 分析美国的 Trumpism 和茶党;Cihan Tuğal 检视了土耳其政权的威权转向;Ruy Braga 解释了巴西了右翼政变;Rodolfo Elbert 分析了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转向;Nandini Sundar 描述了在印度反 Naxelite 运动的持续暴力现象。就像我们曾经讨论的不稳定情境,我们可以从 Karl Polanyi 的市场过度延伸观点来看这些运动的发生和变化。特别是今天的金融资本的规则已经导向了不稳定的全球化,让右翼和左翼的民粹运动相互摆荡,两者的共通点是反对代议民主。

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学系统的金融化。因此,在这期之中,Huw Beynon 分析了失败的管理主义如何接管了英国的大学,而其试图还居然要去获利。他描述评量研究“杰出”的系统如何生产了糟糕的研究,而还有对于费用的依赖如何让学生成为消费者,而大学成为广告商,为的无非就是去最大化学生的“满意程度”。有一个大问题是,英国的企业大学模式是否可以成为世界其他地方的效法,或是其他的模式像是 Neil McLaughlin 和 Antony Pudding 所说的加拿大处境会成功,不过即使在加拿大,学界还是要对抗保守的政府的越界。

我们也刊登了 4 篇纪念 John Urry 的文章,他不幸地在今年 3 月过世了。John Urry 是世界上最具原创性和最多产的社会学家,在许多领域都是先驱,从资本主义的转型到观光的重要性,把社会研究带入了地利多重流动性。从全球暖化到最近他的新着《Offshoring》,此书处理了经济扩张如何恶化了全球不平等和人权价值的违反。人们会记住他是未来的社会学家,因为他勇闯这个地球最灾难的领域。

此外还有其他 3 篇文章,分别讨论美国对抗性骚扰的学生运动,对于 Mondragon 合作社的辩护,以及《全球对话》的罗马尼亚团队如何克服翻译的挑战。我们希望其他团队也可以写写关于他们翻译的经验。

全球對話以 16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Nandini Sundar, 印度社会学家, 研究政治暴力, 是《The Burning Forest》一书作者, 剖析印度的 Chhattisgarh 省的战争。



Cihan Tuğal, 土耳其学者, 《Passive Revolution: Absorbing the Islamic Challenge to Capitalism》一书作者, 认为土耳其是 21 世纪威权主义的代表。



Ruy Braga, 是巴西著名的评论下层阶级和工党 (PT) 的学者, 分析巴西政治最新的危机。



Global Dialogue由SAGE出版社提供贊助。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主编:	Gay Seidman.
副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y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度尼西亚: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Mitra Daneshvar,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Yutaro Shimokawa, Shinsa Kameo, Yuki Nakano.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Gani Madi, Almash Tlespayeva, Almas Rakhimbayev, Amangeldi Kurmetuly.
波兰:	Jakub Barszczewski, Adrianna Drozdowska, Krzysztof Gubański,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Lipiń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a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 Teresa Teleżyńska, Anna Wandzel, Justyna Zielińska, Jacek Zych.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ş, Corina Brăgaru, Costinel Anuța, Tatiana Cojocari, Andrei Dobre, Alexandra Isbășoiu, Rodica Liseanu, Mihai-Bogdan Marian, Anda-Olivia Marin, Ramona Marinache, Anca Mihai, Oana-Elena Negrea, Ion Daniel Popa, Diana Tihan, Elena Tudor,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ş, Carmen Voinea, Irina Zamfi rescu.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Lyubov Chernyshova, Anastasija Golovneva.
台湾:	何經戀
土耳其:	Gül Çorbacioğlu, İrmak Evren.
媒体顾问	Gustavo Taniguti.
编辑顾问:	Ana Villarreal.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21世纪的民粹主义	2
> 右翼的宰制	
民主的自我交战	
by Nandini Sundar, 印度	4
土耳其威权主义：引领潮流而非文化好奇？	
by Cihan Tuğal, 美国	7
巴西卢拉主义的结束和宫廷政变	
by Ruy Braga, 巴西	10
阿根廷劳工运动和新自由主义的返回	
by Rodolfo Elbert, 阿根廷	13
美国右翼的故事	
by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美国	15
> 大学和社会学	
英国的企业大学的兴起	
by Huw Beynon, 英国	18
加拿大的“社会学战争”	
by Neil McLaughlin and Antony Puddephatt, 加拿大	22
> 纪念	
纪念John Urry和期作品	
by Andrew Sayer, 英国	25
John Urry：社会学和未来	
by Scott Lash, 英国	27
John Urry：社会学家的社会学家	
by Bob Jessop, 英国	29
相近与流动：纪念John Urry	
by Mimi Sheller, 美国	31
> 特辑	
学生反性侵害的运动	
by Ana Vidu and Tinka Schubert, 西班牙	33
Mondragon 的第三条路：回应Sharryn Kasmir	
by Ignacio Santa Cruz Ayo and Eva Alonso, 西班牙	35
《全球对话》的罗马尼亚翻译	
by Costinel Anuța, Corina Brăgaru, Anca Mihai, Oana Negrea, Ion Daniel Popa, 和Diana Tihan	37



> 自我交战的民主

by Nandini Sundar, 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 印度



Salwa Judum - 政府支持的私刑队。不知名的人所摄影。

Nandini Sundar 是研究政治暴力的知名社会学家。她花了 25 年的时间研究 Bastar。那是一个冲突不断的城市，位于中印度 Chhattisgarh。她在念博士的时候就住在那，博士论文后来出版了，叫做《Subalterns and Sovereigns: An Anthropological History of Bastar 1854-1996》(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之后的一本书酝酿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是《The Burning Forest: India's War in Bastar》(Juggernaut Press, 2016)，描述了 Bastar 如何变成了战整，如何被外部政治力量所形塑，她自己在面对最高法院的经验，以及几乎长达十年的发绿过程，这段过程是试图要去在宪法上对抗那对于人权受到侵害的牺牲者的私刑对待。虽然她和同事在 2011 年收到了让好的判决，但是国家还是忽略这项判决，继续其反社会抗争的政策。《The Burning Forest》一书试图去捕捉制度的失败、国家赦免、公众抵抗的交错力量如何形塑了印度民主。

印

度的民主总是吸引的很强的意见。印度的政治人物、主流媒体、精英等认为在后殖民社会之中，印度是值得骄傲的，因为它有普遍选举权，联邦制度，军队国家化，以及独立司法体系。可是运动者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说印度的民主很可耻，因为保留了殖民时代的“紧急状态”法律，像是东北武装部队 (AFSPA)，这让军队可以射杀可疑平民，也造成时有闻知的非法处决，刑求，强暴，失踪等等。而且还有和政党相关的组织屠杀，像是对弱势族群 Sikhs 人 (Delhi, 1984) 和穆斯林 (Gujarat, 2002) 等的攻击。

学术界对于印度民主的讨论集中在政治学，并且处理政党、选举、制度架构、发展政府。反之，我采取了社会学的取径，试图去保持中立，这就是在《The Burning Forest》一书之中的方式，然后去检视政府的反射运暴乱政策，镇压“极左派”，然后探讨这些对印度民主的影响。

印度现在对于毛派印度共产党游击队 (Naxalites) 的打击已经十年了。但是虽然第一阶段的 Naxalites 运动在 60 年代末期发生并且在 70 年代暴力地粉碎，我们总是没有看到有详细地对于当代发展的寄载。这是因为这项研究本身是很困难的，因为研究对象有争议，但是也因为该运动集中在原住民或是特定的卡司特阶级上面，特别是在乡下或是丛林地带。这和该运动早起的发展是相反的，因为那时候有中产阶级、城市、学生的参与。现在许多的描述都是来自于和那些毛派人士一起旅行的记者所写的，或是由智库所报导。

虽然毛主义共党运动扩散到了很多地方，但是战争的核心是密集森林、矿产丰富的地带，也就是 Bastar，那里住了很多原住民，是一个有 39,114 平方公里大的区域，位于中印度的 Chhattisgarh 省。毛派当初到了这里侍从邻近的 Andhra Pradesh 省来，是为了躲避镇压而来的，但是在地居民开始有了自己的需求。从 1980 年代开始，毛派军队建立了一个平行的省政府，分配土地，设立了集体工作队，处理纷争，征税，然后开始建立关系。当村人开始参与毛派政府运作之后，他们结合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里面。

在 2005 年的 6 月，印度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发起了一个私刑组织叫做 Salwa Judum (净化狩猎)，位于西南的 Bastar。其称自己叫做反对“Naxalite 暴力”的“人民运动”。这个政策由地方的阶级结构所支撑起来，也就是外来者对于当地居民的种族歧视支持了国家的现代化政策，奠基在把原住民拉去采矿的政策实施上面。Salwa Judum 的领导者都非原住民，然后都是 Bharatiya Janata 党 (BJP) 或是议会的桩脚，这些都把毛主义者视为威胁，因为

毛主义反对矿业的投资。

在 2005 和 2007 年间，Salwa Judum 的部队和维安部队开始烧房子，抢粮食、牲畜、金钱，然后强暴和杀戮村民。毛派开始报复，大约有 50,000 村人被迫加入“慰安营”，也有相同数量的人逃走。虽然 2007 年之后，开始有人回去，但是对于那些当初有幸逃跑的人来说，也有长期的创伤。

根据官方资料，在 2005 和 2016 年之间，总共有包括平民、毛主义者、维安警力共 2468 人被杀。而真正的人数通常是更高的，多数发生在 2005 到 2007 年，以及 2009 到 2011 年。在 Operation Green Hunt 的时候，当政府派遣了“中央武装警察部队” (CAPF) (只比军队低了一个层级)，还有无人机，直升机，坦克。

而在标准的反社会运动的政策执行下，政府招募了投降的毛主义者去找出他们以前的队友，当地的年轻人认为他们仅仅只是加入警察。这些特殊警察 (SPO) 无法回到自己的村庄，住在警察部队里面，但也被正规警察所看不起。当一些维安人员对于杀戮争取功勋的游戏乐此不疲的时候，也有人对于这样的情况感到非常无助。政治人物和资深的维安官员对于这些现象则永远无动于衷。

今天，Bastar 是印度最武装的区域了，有着维安部队，铁丝网等。即使这样，但是基本的卫生、教育的缺乏还是让毛主义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政府对于维安的花费比对当地的基础福利可是要超出很多。

在这个相似性的前提之下，我想是值得去问：若是当初反运动政策是在民主制度下执行，而非在殖民体制下，那会有不一样吗？制度和行动者，包括政党和人权组织、媒体、司法，会如何回应？

议会政治已经和战争无关，因为印度的主流政党：议会党和 BJP，都合作推动它了。当前的议会共产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尽管有着强大的镇压，其也没有在国家的层级上有太大影响力。其它像是国家人权委员会已经不再中立，而且开始积极妥协，而且选举和补偿制度让国家开始正当化之后，不论有无效率或有无民主，那都无关紧要了。

虽然印度的媒体相当自由且有活力，但是基于经济利益，它们还是不会太得罪政府。那些反暴动的地方都是远离都市的区域，那些几乎都违反了人权，可是都没有什么人关心。对于 Bastar 的报导从完全忽视到相对多数的报导，但是这没有让政府更负责。在英语和印度语媒体之间的结构性差异，特别是后者都有着经济和政治上的限制，这些都有影响。

人权组织已经在揭露滥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且和毛主义者协商人质，并且把辩论聚焦在国家与游击队的暴力上面。同时，

都市社运者对于因特网日益依赖也让重要议题模糊了。在 Chhattisgarh，政府对于私刑的支持也伴随着反恐法律的制定。他们逮捕知名的医生和人权社运者，让中产阶级担忧起来，即使释放这些人，对于那些暴露在这些危险之下的一般人们也毫无帮助。

当地方法院失败了，然后导致一般村民的高入囚禁率和 Chhattisgarh 丛生的监狱数量，印度的最高法院还是在 Bastar 这个大量的侵害案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是，无穷的延迟和国家对于法律判决的忽略，这些都意味着法律还没有办法实现正义。尽管法院对于 Chhattisgarh 政府的明确禁止私刑组织，像是 Salwa Judum，以及要他们停止招募在地人去加入其反叛乱的行动，补偿被害人，和惩罚那些违反者，但是政府还是继续违法，当法院不存在一样，

自从 Modi 政府 2014 年上台以来，一些的 Salwa Judum 元素已经被复苏了。对于 BJP 来说，国家支持的私刑是成为一种常态的政治。可是，公民还是继续相信并且为民主奋斗，即使实际的民主离理想还是很遥远。■

來信寄給 Nandini Sundar <nandinisundar@yahoo.com>



村民游行抗议Salwa Judum。不知名的人所摄影。

> 土耳其威权主义

普遍的现象而非文化个殊性？

by Cihan Tug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国



土耳其政府和库德族工党(PKK)之间于2013年得来不易的停火协议。在2015年暑期被Ankara所毁约。

土耳其的威权主义让许多观察家都惊讶不已，才在不久之前，这个国家被视为是中东地区的自由主义的灯塔。但是现在的学者则试图去理解土耳其总统 Erdoğan 的个性转变，以及土耳其文化的特殊性。

但是有一份对于自由派的分系给了我们一些线索（并且也给民主的西方了一些启示）。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曾经被视为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可是，若是“自由主义”意味着崇尚着个人财产和自由，则因为和当今的新自由主义潮流（财产私有化、福利国家重组、财务金融化等）是携手并进的，那么其实土耳其的例子告诉了我们民主和自由化只可以共存一段时间，并且有关于国家的压制实力、公民社会和政治的能力。

土耳其最近的经验或许可以给其他国家一些警惕。知识分子曾经相信发展的后段国家可以把资本主义国家当榜样，然而在 1930 年代的萧条之后，许多人认为可能刚好是相反的：许多欧洲人也经历了那些被殖民者的痛苦生活。大众赋权和个人财产权和自由削弱了彼此的历史上的重要性（战时），然而这两者可以再度携手吗？

> 错误的自由天堂

土耳其曾经是中东最民主的世俗国家。其特殊之处是奠基在保守党的凯穆尔主义上面的。从 1950 年代开始，许多中间右派的政党逐渐地解放了民族主义者、统合主义者、世俗政权，该政权是 Mustafa Kemal 在 20 世纪初期创建的。在 2000 年代，新的政党：

>>

正义与发展党进一步大众化了中间偏右的政纲，结合了该国的保守和伊斯兰传统，这让知识分子和大众相当激情，支持 1970 年代就被引进但是不被注意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但是，这个成功故事的背后有着黑暗的一片。主流的论述把土耳其的自由化当作模范，这忽略了挑战政府论述的团体：Alevi 的被打压。这包括了罢工工人，环境主义者，左派，以及有时候库德族的加入。西方世界的土耳其自由派选择默视正义发展党的宗派和文化政纲。其认为镇压是达到目的微小代价而已，因为更重要的是高经济成长和凯穆尔军事政权的退位。环境破坏、工人死亡、廉价工资、去政治化、去工会化、逊尼派的增加、家长制的暴力、都市的被迫迁徙等等，都是被所谓的那些新自由主义成就所造成的。

在正义发展党的头两期任其中，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造成了许多痛苦，并且也开启了竞争的大门。在 2013 年夏天，环境和政治运动突破了其地方的界线。当自主的女性运动、Alevi 和世俗主义者加入之后，多数的都市起义也爆发了，像是 Gezi 运动，这造就了土耳其的历史高峰。可是，虽然有上百万的公民参与了，他们却没有办法开启一个共同的政治平台。工人和库德族领导也只有有限地支持 Gezi 抗争，左派也没有全心投入，所有这三种势力都因此为他们的不情愿、困惑、无能而付出了代价。

在 2013 年，受到了政府增加的伊斯兰和威权主义，许多自由派和那些反叛派站在一起，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成功。反叛证明了他们没有办法扩张其政治纲领到抗争之外，Gezi 公园也没有办法保住。

► 自由主义变质成威权主义

尽管反叛一方很脆弱，政府还是用阴谋论暴力地镇压了反叛运动。事后，执政党不仅变得更威权，还甚至独裁，动员去打压异己。

为什么这个转变发生了？自由主义加强社会紧张的关系，而非缓和。这和统合主义的目标不通。结构上强大的政体是可以在自由主义之下吸收社会的紧张关系的。弱的国家则无法在自由主义内达成。特别是当政体在面对强大的反对时，是可能无法控制反对运动的。在这个脉络下，精英只好依靠反动员，然后为独裁埋下基础。这个路径不仅仅

是被精英所控制，但也被政治和公民团体的存在所影响。

这样的网络对于土耳其的正义发展党来说是可得的，因为其基础是在 60 到 90 年代的伊斯兰动员。在 2013 年之后，为了响应高涨的威胁，土耳其政府从我称为的“软独裁主义”转变成“硬独裁”主义，反对 Alevi、罢工工人、环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然后最后反对自由派。

讽刺的是，最强的后 2013 年整肃对准了自由派的伊斯兰团体：Gülen。这一个温和的威权主义政党，悄悄地穿透了各个组织，架空了政府的 Alevi 和左派。该团体试图低调的进行整肃，和今天所看到的公开和仪式化的整肃大相径庭。而在 Gülen 团体和老伊斯兰团体之间也有斗争，是在都争怎么分享权利，但这个斗争在 Erdoğan 和以色列产生紧张关系之前并没有台面化。Gülen 是和美国的游说团体还有其他西方国家有紧密链接的组织，那时就对于 Erdoğan 的反以色列立场有所质疑。而最关键的事件在于 Erdoğan 所支持的土耳其慈善组织破坏了 Gaza 的封锁线。Gülen 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访问，说该行动是非伊斯兰的，并且藐视政府。之后，正义发展党的两个势力分道扬镳，这对于政府来说是很大的代价，因为缺乏了高素质的政党干部。这让政府转向了大众的动员和民粹。

在这样的威权主义逼近之下，一个比较地方但是却较为偶然和动态的现象产生了。阿拉伯地区的革命为土耳其的伊斯兰派带来了希望。除了自由派右翼和自由派左翼，其实伊斯兰派总是希望恢复鄂图曼帝国。正义和发展党的领导人减低了其军事特质，结合政治实用主义和新经济与政治前景，但是在 2011 和 2013 年之间，该党的帝国野心扩张了，然后就失控了。

正义发展党的自由派和西方支持者希望政党的长期帝国倾向可以被制度化为“软实力”，这是被前学者也是外交部长的当时的总理 Ahmed Davutoğlu 所承诺的。他有两个原则：“和邻国不起问题”和“策略深度”。阿拉伯之春刚刚开始的时候，似乎 Davutoğlu 的努力被深化了，但是他在 2016 年被清算了，为什么？Erdoğan 的个性。不太是。若是政府可以利用阿拉伯之春，那政府也不用放弃软实力路线了。就像许多其他资本主义



2016年7月16日的失败政变。这让威权主义深化了。

国家，政商的连带在土耳其也试着要扩展外国市场，但是劳动运动、政治分化、内战和军事介入，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阿拉伯资本家锁定的市场已经不再有吸引立了，这些地缘政治经济瓶颈和世界市场限缩了商业的扩张。政府现在现金少了，不能重分配了，开启了土耳其的伊斯兰商业阶级的福利制度的新问题，经济衰退了，那政府只好强调伊斯兰的价值了。

在叙利亚，土耳其的一开使的经济理性努力想要把 Assad 移走，让一个比较亲商的伊斯兰政府上台，可是这项努力被逊尼的建国派所中断了。这个失算导致了 ISIS 的产生，一开始被视为是对于库德族的一种反向平衡，是好事，但是后来却很不稳定，让西部和南部土耳其的旅游观光和生意大受影响。此外，一般认为反 Assad 的圣战士和这个中东的唯一民主国家之间有合作的迹象，这让西方更加认为伊斯兰和民主难以并存。

这个转变的事后发展有着全球的意义。土耳其的机会主义毁灭了叙利亚，造成了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到欧洲，因此也有最大的右翼动员。欧洲右翼担心军事伊斯兰主义，给了土耳其一个很明确的讯息，那就是整个欧盟不再可能了。2006 后这虽然已经很明朗了，但是在 2010 年之前并没有让土耳其的政纲有太大的转变，欧洲的绝望也和其他削弱自由主义的势力相互增强。当阿拉伯人口向往自由（土耳其精英希望可以为了其商业和帝国野心而操弄）的同时，土耳其伊斯兰派失去了讨好的欧洲的兴趣。

► 土耳其的路径如何可能在其他地方重蹈覆辙

即使上述的动态许多是土耳其的特殊之处，整体削弱自由主义的结构在全球是有可能出现许多类似土耳其的案例的，特别是这

是地方和民族国家的互动，也是地方和全球过程的互动。更重要的是，全球上伊斯兰内部的右派转向已经让西方震惊不已了，激起了不仅仅市政府的世俗化还包括了右翼的动员。这些恶性循环是有全球的结构基础的。

现代历史的两大自由化循环都以全球的姿态展开。在两个时期，解组是全球也是地方的现象。20 年代之后，古典自由主义变成了美国和西欧的镶嵌自由主义，然后东方则是威权和独裁政府的兴起。由于释放的社会力和世俗化，镶嵌自由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除非知识分子、政治人物、运动者成功地找处了另外的全球替代道路，大规模动员会产生持续更长的威权主义国家，甚至会在西方发生。土耳其的经验视对所有人来说的警钟，失败的革命会导致更灾难的后果。现在的脉络下，若是坚固的政治纲领在 Gezi、Occupy、Indignados 等运动后没有被具体执行，那代价可是非常高的。■

來信寄給 Cihan Tuğal <ctugal@berkeley.edu>

> 巴西卢拉主义的结束 和宫廷政变

by Ruy Braga,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巴西, ISA劳动运动研究委员会(RC44)



巴西的议会政变：下议院投票弹劾总统Rousseff。

总体来说，对于巴西限在的政治经济危机之分析主要强调政府经济政策的错误，以及工党(PT)总统Dilma Rousseff所继承前任总统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路线的失败。虽然政府政策是让这次冲突提高的原因之一，但是这样的观点太过于狭隘了，没有办法解释限在危机的复杂性。这些解释试图模糊了阶级结构的变化，但是这是发生在Lula时代的事情，并且忽略了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的确，这样的分析没有办法解释政治管制和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没办法看到这不但无发缓和阶级冲突，反而将之激进化。

> 罢工周期

在工作的世界里面，任何在从属和宰制阶级之间的瓦解通常以罢工的形式展开。按照工会统计和社会经济研究部门的Strike Tracking System的最新资料(SAG-DIEESE)，巴西的工人2013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罢工潮，总共2,050次罢工，这是134%幅度的增加。因此，这个国家前20年的少数罢工和工会运动可说是大转向。在许多的主要城市里面，在2013和2015年之间工会工人的罢工成为常态。教师，公务员，钢铁工人，建筑工人，司机等也有参与工运增加的倾向。相

同的，私人部门的工会也从2012年急速的增加了。

在2013年，私人部门的罢工代表了54%的总量。这里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服务业的工作爆增，包括了非技术和半技术的工人。许多工作都被外包且无偿，这是因为不稳定的工作合约和劳工权利的缺乏。而除了8次的全国大罢工之外，银行的雇员，观光业劳工，清洁工，健康产业，安全，教育，通讯等领域的罢工特别活跃，交通部门也是。

总之，工会踊跃地扩张到各个部门的工人，并且被认为是工会军事策略的核心。即使在公共部门，罢工也发生了，并且扩展到公部门的不稳定临时契约工去。总体说来，不论在私或是公部门，罢工从“中心移到了边陲”，包括了许多增加都市临时不稳定契约工。

所以在这个罢工周期的前提之下，或许这里可以看到最被低估的一种解释：统治阶级不需要工会官僚，因为它们无法控制底层的工人。这个观点来说，只有可靠的统治阶级计划可以让资本积累复苏，而且是透过深化社会错置和削减工人权益。

而现在的罢工周期消长和巴西所面临的底层阶级的生活困苦可谓是显示了卢拉主义的限制。为了了解这个

计划的矛盾所在，我们要去分析 PT 的不稳定霸权之限制在过去 13 年如何演变。

＞ 危险的霸权

卢拉主义 (Lulism) 被理解为是阶级冲突的管理模式，因为其作为霸权的社会关系是奠基在两个不同但是互补的同意形式上面的。而两者一起生产了过去十年相对的社会平和。巴西的底层阶级给予了政府被动的同意，政府的政策则是由工会官僚所背书的。这确保了一定程度且有效的让步给工人，至少在经济扩张的时期是如此。

而半乡村的无产阶级是受益于 Bolsa Família 计划的（家庭基金），这处要是从极端贫穷到官方的贫穷在线。而都市工人阶级也被最低工资的提高所吸引，以及也被劳动市场的形式化和就业增加所吸引。工会的工人得利于扩张的劳动力市场，也透过集体议价而得到较高的工资。

至少在 2014 年总统大选之前，PT 结合了重分配政策、正式工作的开创、以及大众对于信用的取得，然后推动一个轻微的去集中化的全国经济重分配。在不平等的巴西，这个一小步其实是足够保住工人底层阶级的同意的，并且也保住卢拉主义的政治管理。

同时，PT 政府也视图去结合工会官僚的兴趣，社会运动的领袖和知识分子化的中产阶级，然后开创一个对于奠基于国家机器之卢拉主义的主动同意。上千上万的工会成员被吸纳议会运作、政府部门、公有企业之中。一些运工会官僚占据了福利基金等部门的策略的位置，

那些基金是被国家的投资部门所管理的，像是国家发展银行 (BNDES)，巴西银行，以及 Caixa Econômica Federal。

因此卢拉主义的工会变成了不只是一个主动的布尔乔亚国家的管理阶层，也是个主要的行动者去引导资本的投资。因为这个政治管理权力没有包括私人资本，工会官僚所占据的优势社会位置主要依赖于国家机器，而为了去再生产这个控制，两者的利益，盟友一中层官僚和小知识布尔乔亚，和敌人一具有敌意的官僚和企业利益，两者必须要在国家机器中取得平衡。

虽然这个策略被 PT 政府对于反民主原则的巴西选举之接受而复杂化了，包括了在 Lula 第一任期的直接收买议会支持，而在 2014 年之前，Lulista 霸权已经到达了一个可观的成功地步，亦即不论在再生产被动的大众同意或是工会社运的积极同意上，都是成功的。

＞ 卢拉主义的矛盾

然而，社会的矛盾已经展开了，特别是在 2003 年和 2014 年之间的经济扩张，预示现在的危机。尽管令人印象深刻的正式部门工资的上升，有 94% 的工作（在 PT 的第一个十年中被创造出来的）只被支付了 1.5 的最低基本月薪（大约 250 美元）或更少。2014 年之前，当经济减缓时，有 97.5% 的新工作是属于这种，而也多数是女性、年轻人、黑人。也就是说，那些都是之前本来就被歧视或是比要弱势的工人。

同时，年复一年，工殇意外和死亡数量的增加以及

换工作频率的增加，这都表示了工作质量的降低。持续深化的经济危机和撙节政策的方向，主要集中在 Dilma Rousseff 政府时期 (2014 开始)，这些退步都促使了工会工人的罢工决定。

虽然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无产阶级的支持还是让 Dilma Rousseff 顺利选上总统 (2014)。但是这样的支持让 PT 政府会维持正式的工作（但是低质量和低薪）。不过政府支出削减所促使的循环集中也导向了失业率的增加，特别是在都市无产阶级和工会工人阶级。按照最新的研究指出，巴西的失业率在过去一年从 7.9% 增加到了 10.2%。

另外，传统的中产阶级变成了右翼，包括了那些原本和 PT 政府结盟的主要工会联盟 CUT 和至少在 2005 年之前的贿选丑闻 (Mensalão) 之前是如此。我想这并不难去想象为什么。在就业政治化的进步之下，其实薪水提高了，但是就业市场的刺激也提高了服务的代价。这马上影响到的就是中产阶级生活型态。而大众消费的提供也连结到了更高的巴西穷人薪水上面，意味着工人“入侵”到了传统中产阶级的领域，像是购物中心和机场。

最后，低质量的私人大学主要是给工人阶级的小孩的，这也增加了，且让原本只有给中产阶级小孩的就业市场变得更加竞争。当 Petrolão 丑闻，也就是国有石油企业 Petrobras 的洗钱案发生时，中产阶级的不满爆发了，一连串的抗议产生，主要就是不满政府的政策。

因此 Rousseff 政府在

>>

国会中支持的瓦解只是在一连串危机中最显而易见的而已，其根源在于整个萧条经济的社会结构之中。以不稳定工作和收入分配的去集中化为基础，巴西的发展模式不再可以保证企业获利，更不说吸引下层阶级的共识了。

＞ 宫廷政变

面对了越来越糟的危机，主要由银行带领的巴西企业代表开始要求联邦政府更进一步的撙节政策。对大企业而言，那些政策可以深化财务调节，增加失业，控制罢工周期，所以看起来是必要的步骤去启动一系列的不受欢迎的改革，像是社会福利和劳工权益的缩减。

这个计划开始被现任的PT政府的撤退所支持。而财务调节也被应用到Dilma的第二命令的开始，但是这背叛了5千3百万的选民的期待，这些选民士被她的选举所吸引，包括了维持工作、社会福利、劳工权利的主张。第二任Rousseff政府的不受欢迎程度进一步被中产阶级的不满所煽动，他们不满阶级之间不平等的缩小。当联邦政策部门的Lava Jato决定要去聚焦在PT那些牵连到Petrobras贪腐的政治人物的时候，巴西民众开始上街抗议政府。

这个动员也让在2014年败选的政党开始推动弹劾。而在巴西社会民主党(PSDB)和巴西民主运动党(PMDB)之间的谈判也越来越激烈，但是在后者的政治宣言“通往未来的桥梁”上有所交集，基本上，承诺要去偿付对银行的公共债是用教育、减康、社会安全等的削减作为代价的。



前总统Lula和被弹劾的总统Rousseff。工党的领袖，领导巴西13年。

更重要的是，保守的政治势力开始去推翻巴西政府，并不是因为Rousseff对民众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她无法成功带给企业家讯息，那个讯息就是激进的财政调节，那需要修宪，改革社会安全和放弃主要的劳工保护。然而另外一方面而言，工会大多数被PT控制，而且然处于历史性的罢工周期之中。

因此巴西现在正处于一个死结当中：政变开始面临了大众的反抗，而这个反抗将会让死结更紧。非法政府所采用更攻击性的手段也被国会所采用，所以可以预期的是一个更前所未见的社会抗争的出现。■

來信寄給 Ruy Braga

<ruy.braga@uol.com.br>

注1：关于巴西的这三个下层阶级，件 André Singer, Os sentidos do lulismo: reforma gradual e pacto conservador (São Paulo, Companhia das Letras, 2012); Ruy Braga, A política do precariado: dopopulismo à hegemonia lulista (São Paulo: Boitempo, 2012); and Roberto Vêras de Oliveira, Maria Aparecida

Bridi and Marcos Ferraz, O sindicalismo na EraLula: paradoxos, perspectivas e olhares (Belo Horizonte, Fino Traço, 2014).

> 阿根廷的劳工政治

和重返新自由主义

by Rodolfo Elbert, Conicet and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阿根廷, ISA劳工运动研究委员会(RC44)



Northern Gran Buenos Aires的劳工抗议解雇。Sebastián Lineros摄影。

在 2015年11月22日，阿根廷选出了Mauricio Macri作为2015-19的总统，而且只有赢得了小于3%的全国选票。Macri之所以可以击败Peronista候选人Daniel Scioli，代表了长期Kirchnerista的时代的结束(2003-2-2015)。在增加的国家介入经济和有限财富分配的时代之后，中间偏右的候选人佐以反贪腐的论述赢得了大选。

对这个成功的解释迫使了一种反民粹的动员，这发生在经济停滞的阿根廷都市中产阶级中。但是任何对于失败的几也需要纳入工人政治的讨论。Kirchnerista政府危机的根源是可以在这个矛盾的进步财富分配和工人阶级分化的处境中找到。透过和Kirchners的结盟，阿根廷的长期工会官僚已经帮助建构了一个分化的工人公民身份，而左派的草根工会也动员去反对不平等。一旦经济的停滞销蚀政府有限的重分配政策，那的代表了Ruy Braga所说的“不稳定霸权”之社会的分化就造成了选举的失败。对于新自由主义入侵的反抗需要纳入相同的草根工会在Kirchnerista时期去对抗经济不

安全，

在2000年代晚期，就像世界的其他地方开始出现了金融危机一样，阿根廷也精力的不同的重生。这是一个新的“草根工会主义”(sindicalismo de base)的出现。这个运动的出现似乎预告了劳工运动的重生，特别是在阿根廷2001-02的经济危机重创全国经济和光荣的工会的十年之后。例如，在Northern Gran Buenos Aires的贫穷地区Los Tilos，居民组织的土地占有运动，要求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房屋，然齁坚持公司必须停止污染河川。要知道的是，尽管这些人住在工业区附近，但是这些人大多是失业的。

令人惊讶的是，Los Tilos的2010抗议受到了强大的支持，支持来自于代表正式工人的工会，大部分是在附近的工业受雇的工人。做为重新活化工运的一部分，在许多Northern Gran Buenos Aires地区的工厂企业的工人运动都是被草根民主工会所领导的。但是许多全国的工会仍然是由传统官僚工会干部领导，他们是Kirchnerista政府

(2003 年上台) 的同路人。总之, 这些官僚工会追求的是排他的策略, 鲜少支持与都市穷人的团结, 并且总是允许资方去雇用临时契约工人, 然后确保核心的工人有教高的薪资。

但是在 2000 年晚期的草根工会运动出现之后, 这个工会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左倾的工会, 寻求正式与非正式工人之间的连结, 铲除临时契约工的模式, 然后所有工人都有相同的权利。

而在这个惊人的新工作增加的背后发生了什么事? 矛盾的说来, 阿根廷的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了一个不寻常、破碎的工人公民身份, 并且透过官僚工会的支持而得以可能。在 2001-2002 年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之后, 阿根廷的经济开始成长, 出口增加, 刺激了就业机会, 扩张的国内市场, 然后支持了工会的集体议价权利。

失业减少和工资增加, 加上增加的政府设施和社会福利的补助, 这些主要是针对最贫穷的人口的, 于是中产阶级的消费增加了。按照职业结构的观点来说, 这样的经济增长增加了相对了薪资价值。

然而, 这些重分配的政策有及局限。随着经济扩张, 资本越来越集中, 当然大型的国家 and 跨国企业增加利润的时候更是如此。工人则面对了工作的非形式化和不稳定的危险。按照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数据库 (<http://sedlac.econo.unlp.edu.ar>) 来说, 在 2010 年之前, 有 45.5% 的阿根廷劳工是有非正式受雇的, 这比经济危机时期以前还好些, 但是对于工作和收入的不安全的低收入户来说, 这是重要的资源。

在 2010 年, Cristina Kirchner 政府仍然试图找出新自由主义瓦解的出路。其借着结合有限的财富分配和持续的工人阶级分化而进行之。但是在数年之间, 阿根廷的经济开始历经了受到金融全球化的危机影响。全球商品的价格狂跌, 而政府也努力要去保持其有限的重分配方案。2011 年的时候 Peronista 的政治精英取消了其和官僚工会派别的联合, 拒绝容忍 CGT (总工会) 的政治野心扩张。而在危机时期出现的经济和政治的联合也开始式微。

在 2014 之前, 阿根廷披索的贬值和通胀的压力导致了贫穷的增加和实质工资的降低。而在政府的霸权减弱之后, Peronista 的候选人 Daniel Scioli 输掉了 2015 年的总统竞选宝座, 输给了右翼 Mauricio Mac-

ri。

在这个头 6 个月之中, Marci 的取径可以被称为是阿根廷试图想要回返新自由主义。而政府执行了几个市场导向的政策, 包括了大规模解雇政府雇员, 然后削减政府补助, 例如水电补助。披索的贬值也意味着薪水无法跟上通货膨胀, 让贫穷率大幅提升 (像是 2014 年)。随着通过了新的反劳工法案, 政府也对农业和矿业出口进行减税。这造成了全国了抗议活动 (4/29), 反对解雇, 但是之后也没有其他的行动。

但是, 尽管政府很清楚地反工人权益的政策方向, 其实全国的工会领袖也似乎更担心保留奇功会的制度权力, 也更关心避免个人的贪腐, 保护工人的劳动权益。

在 Kirchnerista 时代, 这个仍然年轻的、面对非形式和不稳定情况的草根工会将会怎么样呢? 有可能的大部分的工人阶级会支持团结的策略、支持那些在非形式和危险状况中的工人吗? 我想现在下判定还太早, 但是可以看看最近的发展得到一些启示。2000 年代晚期, 在甚至是最不受欢迎的工作和官僚环境之中, 一些阿根廷的草根工会也试图要形成和不同工会派别之间成功的连结。虽然这些工会面对更大的挑战, 特别是当他们试图要去把团结上升到国家的层次, 但是似乎很清楚的是劳工运动去对抗新自由主义班师回朝的能力将会有赖于这种策略。另外的策略似乎就是靠劳工运动领袖去积极的去遵守新的市场改革政策, 但是这样只会让阿根廷的工人处境更加艰难而已。■

来信寄给 Rodolfo Elbert <elbert.rodolfo@gmail.com>

> 美国右翼：深层的故事

by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国



| Donald Trump的竞选造势活动。

就像在欧洲、印度、中国、俄国，美国的右派兴起了很大的变动。在某些方面，美国的左派文化转向，包括了第一个黑人总统、非常有可能的第一为女性总统、同性婚姻权等，这些或许遮蔽了这个右转。但是实际上右转就在那里。在过去的几十年，保守的声音越来越宏亮，最受欢迎的电视频道和脱口秀广播都是非常右的。国会两院也都被共和党所把持，共和党也掌握更多的州议员的席次和更多的州长。在50州里面，有23州是参众两院都被共和党所把持的。相反地，只有7州是民主党掌控了参众两院。而有20%的美国人

(4千5百万)支持反税的茶党，并且在最近也踊跃支持民粹本土主义的共和党候选人Donald Trump。其共和党初选的得票率创下了共和党的历史。

左派和右派的区隔点在于又对于联邦政府的讨厌。右派要削减政府福利，包括失业保险、健保Medicaid、大学学费补助、学校午餐等等。共和党甚至要砍掉许多联邦政府的部门，像是教育部、能源部、商业部、内政部。2015年有58个共和党众议员投票废除国家税务局。有些甚至要废除所有的公立学校。

共和党的草根支持者对

于政府失望又愤怒。而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大哉问促使了我到路易斯安那州去做了5年的田野。该州是美国右派的核心地之一。当我为我的新书《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进行访谈时，只浮现了更多的谜题。路易斯安那是全美第二穷的州，比起任何其他州，该州有更多倒闭的学校，有更多生病且肥胖的人，所以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茶党支持者生气？而他们的愤怒又怎么进入了政治？

许多人从个人经验的外部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

>>

想从个人经验的内部出发。所以我参加了该州西南部的共和党女性集会，教会，选举造势场合。我问他们在哪里长大，去哪里上学，父母亲被埋葬到了哪里等等。我也找了我该州朋友的高中毕业纪念册，和他们打牌，然后一起去钓鱼。我总共访问了60人，其中40人是白人、老人、基督教的茶党支持者。我总共汇集了4,600页的访谈和田野笔记。

我也不经义地采用了一个方法。首先，我听他们说。然后我草拟一个他们经验的譬喻诠释，不带入任何价值判断，这种虚拟写实的描述我称为“深层故事”。我相信在我们政治信仰的背后都有着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案例中，故事是像这样子的：你耐心地站在长长队伍的中间，队伍一直延伸到山丘上，其他队伍中的人都和你相像：白人、年老、信仰基督、且绝大多数是男性。而在山的另一头就是美国梦，是每一个人的梦。然后，看！突然间有人就站在你面前插队了，当他们插队之后，你就往后退到队伍的后面的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他们是谁？

许多人是黑人，之所以可以插队就是因为政府的平权法案，他们被给予进入大学的优先权，工作，福利，免费午餐。其他插队的还包括女人，移民，难民，都要进入优渥待遇的政府部门工作，而薪水还是纳税人的钱去支付的，这样下去还有完没完？

当你等待的时候，你还被要求要为这些插队的人道歉，为种族主义、歧视、性别歧视等到欠。你听到收压迫的黑人的故事，受宰制女人的故事，受到惊吓担忧的移民的故事，同性恋的故事，难民的故事。但是某个时间点上，你告诉你自以，

你必须要关闭同情心的边界，特别是向那些可能会带来伤害的人关闭边界。

你其实是个有同情心的人。但是现在你却被要求要把同情心也给那些插队的人。你已经吃很大的亏了，但是你都还没有抱怨或是求救，你也很骄傲你这么做。你相信平等权利，但是，你的权利呢？有人在忽略吗？你的权利就不是权利吗？这并不公平。

你看到黑人总统的名字有个Hussein，然后他跟插队的人招手。他不站在你这边，而站在插队的人的那边。他是那些人的总统，不是你的总统。而且，这个总统不是本身就是插队才当上总统的吗？怎么可能一个单亲妈妈的儿子有可能读得起哥伦比亚和哈佛大学？这或许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还以，总统和他的自由派党羽支持者不就是用你的钱去帮助那些插队的人吗？然后你想把整个政府关掉，因为政府允许插队。

我把这样的故事拿给我的受访者看，看看他们这样的深层故事是否符合他们的想法。虽然有些人改了一些地方（像是“所以我们到了另一队伍”，“那是我们那些被他给出去的钱”等等），受访者都认为那是他们的故事。一个人甚至这样说：“我就住在那个故事里面”；另外有人也说“你完全了解了我的心声”。

为什么这个故事那么真实？简言之，光荣不再。我所遇到的茶党支持者其实并不穷，但是许多都是贫穷出身，也看到了许多亲朋好友又再度贫穷。不过财富不是唯一的幸福和光荣的来源。身为白人，同性恋，基督教，许多人也担忧这种人口结构的消失（“越来越少人像我一样”，有人这么告诉我），

或是害怕变成了宗教少数（“人们不再上教堂了”，“你不能说圣诞节快乐，要说假期快乐”），有些人甚至认为自己是文化少数（“我们是整洁的人，我们奉公守法，但是却被称大男人，恐同，种族主义者，无知，这些都是自由派给我们的标签！”）。若是讲到家乡，通常是乡村的中西部或是南方，有些人被看成是“大老粗”。总之，在这些深层故事的背后，是一种光荣的消逝。

深层故事描述了痛苦（插队），也道出了责备（失败的政府），最后指向了救赎（茶党）。这也是一种情感的表述系统，对插队或是等待的人的同情要有多少，对政府有多么不信任，以及政府的福利有多大程度是可耻的。这个系统成为感觉的规则，告诉我们什么是什么我们认为“该与不该”去感觉的。许多服务业其实都要求其员工要去遵守这种情感规则（“对客人生气是错的，客人都是对的。”）员工学习到怎么管理自己的情绪，然后上司会看看你怎么管理。同样地，政治意识形态也包含了情感规则。领导者指引同情、质疑、责备、可耻，电台主持人天天讲这些规则，然后地方的或是在线社群则监督着。

左派或右派遵守着很不一样的情感规则。大体上，左派呼吁要同情弱势，政府要帮助他们。右派则不。左派要人们相信政府，但是右派怀疑。左派为政府帮助赋予尊严和权利，但是右派觉得可耻。

在这场文化战争之中，我研究的茶党人士都认为情感规则被左派把持了。“我们受够了政治正确！”Trump这么大声叫着，呼应着右派的感情。一位男性受访者告诉我，“自由派



Donald Trump在Phoenix谈他最喜欢的议题：移民。

想让我们对移民和难民感到抱歉，但是我看到一群说可怜我可怜我可怜我。”另外一位说，“自由派从政府那边得到好处，但是我很高兴我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但是他们却要我感激他们所得到的好处。”而许多人则是把接受福利当作可耻的，且轻视那些作弊者。“我知道有人在狩猎季节申请失业。”或是“很多住在可移动房子的人说自己瘫痪不能走动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头还能抬起来，而且政府还鼓励。”许多茶党人士则抗拒说要同情插队的人、感谢政府、或是理直气壮地接受福利的想法。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受访者都同意。的确，针对这点，我的受访者有两派见解。第一是传统的茶党支持者想要把插队和政府对于插队者的鼓励都拿掉。但是Trump的支持者则是想要保留福利，但是福利只能给本土的人，多数当然是白人。

Trump的宣称一直模糊且游移，但是评论家发现他从来没有说要删减Medicaid。他甚至计划要取代Obamacare，把健保延长给那些没有保险的人，是一个更棒的系统。另外Trump也把羞耻带到他人身上，譬如嘲笑John McCain，残障的记者，女性Fox新闻记者，

非法墨西哥人，墨西哥裔的法官，穆斯林，共和党幕僚，但是他从来没有嘲笑过接受Medicaid的人。

但为了正当化给白人的福利，Trump必须把这个赋予男子气概。这或许是他这么受到欢迎的秘密武器。他为那些争论、拥枪、强硬的男人喝采。许多接受福利的是女人，小孩，还有有色男人。但是这些白人却是穷的，或是怕穷的人。Trump说接受福利是一种男性的事情，可以的。你可以在你的卡车上放持枪证，可以争论，可以很大男人，同时也可以接受政府福利。

重要的是，许多的Trump蓝领白人支持者面对的早期黑人所面对的经济困难：没有工作、低薪、失落。这些人之中，有更多的单亲爸爸，更多的离婚，更多的小孩，以及更艰难的生活。他们若现在没有接受Medicaid补助，那以后也将会是。所以他们其实是需要右派长期以来反对的政府补助。不接受福利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区别“真男人”和“真鲁蛇”。我许多的受访者中，一开始对于Trump的保留福利政策都没有提及，但是一旦被问到给予“一般人”的福利时，他们会说：“Trump并不反对那些啊，当你因为低薪而接受福利，你不会希

望被人瞧不起啊。”

Trump技巧性地让蓝领白人从羞耻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不包括非本地或是非白人。的确，Trump对于这种深层故事的响应已经开启了一种反移民、支持福利的国家的右派民粹主义，这在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东欧都可以看得到。我相信所有这些右派运动都有着不同的深层故事，召唤着不同的情感和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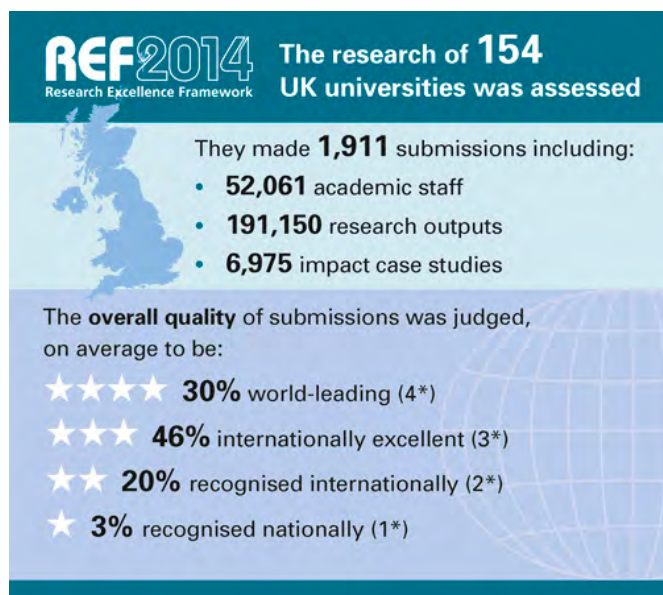
來信寄給 Arlie Hochschild
<ahochsch@berkeley.edu>

注1: Hochschild, A. (2016)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New Press.

注2: 见: Hochschild, A.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英国企业大学的兴起

by Huw Beynon, Cardiff University, 英国



2014年送给研究卓越架构的报告总结。

英”的体系，只有 10% 的人到高等教育，而多数的年轻人则是通过复杂的技职系统。

在 Thatcher 政府之下，英国制造业的衰败也促使的“知识经济”的辩论，导致了 Blair 对于“教育、教育、教育”的强调。他认为 50% 的英国小孩应该上大学，如此一来，大学开始变成政府经济的重要一环，这样的转变让高等教予的责任移到了贸易工业部上面。今天，这个责任在于商业创新技术部，其最近的政策白皮书是：“知识经济的成功：卓越教学，社会流动，学生选择”，这显示了曾经的乌托邦理想怎么提供了反动政策改变的意识形态基础。

这个策略转变是被英国大学的资金补助所帮助的，包括了从中央政府的资金转移到了以学费为主的系统。1998 年，学杂费是每年 3000 英镑，那时是新的工党政府。现在提高到了 9000 英镑，预期还会涨价。在北爱尔兰、苏格兰、韦尔斯等有不同，但是英格兰的高等教育已经扩张成为了学生的负债来源，且复杂的贷款系统让这更加沉重。

新的资金来源系统是变迁的主要原因。大学竞相去招生，带来了严重的教育后果：学生不再是学生，而是顾客。或许更矛盾的是，其引进的市场模式也带来了许多国家监视的机制。

2005 年 Blair 政府把一个密集劳动的

英国大学正在改变之中，透过一种很基础的方式在改变，不容易预测会怎么变化。但是确定的是，工作和研究环境是和和十年之前大不相同的。Stefan Collini 最近说那“我们仍然称为大学的东西将要被重塑成许多应用知识和职业训练的场所，从属于社会的经济需求”。这也呼应了 John Holmwood 的 2014 年的英国社会学会会长致词。他说英国的大学系统现在成为了更新的父权资本主义核心，并且深化了不平等。这些变迁对于社会学的影响不太清楚，但是有些担忧是有迹可循的。

> 资金：从筹募到收费

历史上，在 Thatcher 和 Blair 政府以前，英国大学是半独立的慈善机构的。而学生数量也是全国性的一致，每个大学接受一定的补助。可是后来成为了“精

系统：质量评量（这是用来提升教学质量并透过使用标准化教室程序而达成的方式）换成了国家学生评量（NSS）。这是某个像是一个消费者市场调查的方式，收集学生对于课程和系所的评量。这些数据将会马上变成判定什么是最好大学的标准，然后会发表在各大报章杂志上。

现在的政府规划要去改进这种评量系统，想透过引进更复杂的教学卓越架构（TEF），这考虑了学生的留级和就业表现，以及学生评鉴。虽然每个方式都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但是政府规划要建构一个新的TEF系统，并在“我们期待会逐渐增加其差异性的收费”为基础上执行。

＞从研究评量到研究卓越

在旧的资金系统里面，大学雇员被期待要去教学和做研究，大概是3:2的比例。而公共资金的学术研究委员会则提供额外的研究资金，主要透过竞争而取得。Thatcher政府已经关注到校园的激进和批判声音，坚持要把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改名成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长期以来这个组织已经逐渐被裁剪成英国经济所适合的样子了。更重要的是，一个一般每五年一次的研究评量就被引进大学系所。研究评量活动在80年代变成了非正式，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连结到未来的研究资金，和旧有的资金系统脱勾。

接下来的重复也看到了这个评量系统怎么延伸出去。2015年，对于研究卓越架构（REF）改名也包括了进一步的行动：新的评量出版研究的方式对“社会和经济有所帮助”。专家也会“审查论述的证据，指标和评分后的影响。”这些档案将会评分区分等级，从“世界领导级”（四星），“世界顶尖级”（三星），“国际认可级”（二星），到“国家认可级”（一星）。

而外部的评鉴过程的研究策略讨论也从边陲移到了中央，像是用“明星”就在学术论述中出现了，随着“卓越”、“扎实”、“严谨”、“透明”等用语，这建构了一个似乎无法反对的论述结构，

也被接受了。这样一来，“研究卓越架构”（Ref）、“可被研究卓越架构所认可的”（Ref-able）、“可以被研究卓越架构所评量的”（Ref-ready）变成了强而有力的名词。

＞企业大学

这些变迁也是部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变了英国的工部门。这个在高等教育机构发生的变化和那些重塑这个国家健康服务产业、税收、警察、教育的变化是平行的。大学竞相收学生是现在收入的来源，而且为了得到一些标签，大学像是企业，不在是慈善组织。

大学校长们不再是被看成是同等的，反而像是CEO，薪水是有高低分别的，而且有自己的年退休金计算方式。当现在保守政府把学生人数上限移除之后，可能会多收很多学生一而现金存量在2011年是65亿。这就是在鼓励英国大学跟美国大学看齐，往债卷市场和房地产投资，许多管理的精英认为这些新建筑是成功的代表。

在试图提高招生（收钱）的时候，大学其实也因为国外学生的签证限制而受限，于是便把分校往国外开设，提供一些大学职员很难拒绝的方案。有成功的案例，但是也有失败的。在2015年，Aberystwyth大学花费了五十万英镑去Mauritius设立分校给英国和国际学生，希望可以提供“新的机会给学生去拥有高质量教育。”但是2016年之前，只有40名学生注册到这所可以容纳2000人的学校。一个前大学校长这么评论：“这个投资很疯狂，他们若是把更多资源投入到教师和职员上面，吸引更多国内的学生，那会更好。”

所有这些都关于这个场域压力极大的转变，而并且对于学术人员来说有着非常真实的意义。新的企业大学试图去透过让校长决定在新的管理和由上而下的模式中要达成那些目标，然后进一步中心化。新的管理阶层于是出现，像是技术和财务的“支持人员”。这以往是院系或是中心自己自主的领域，但是限在有一个中央

的组织来负责。沟通逐渐只透过 email 而非面对面接触，简单的操作像是保留一间会议室都要都过训练使用计算机来达成。当“程序”成为管理工具，那他们就强化了这种标准化的压力，而这在许多大学里面被链接到绩效表现管理系统。成效相关的薪资也在其议程上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这还把所有的学术人员移到了新的、唯有教学的契约上。

这种在政府治理结构里面的“官僚”和“目标错置”的病征——用以前 Alvin Gouldner 所说的词——就明显的存在英国的大学里面，特别是教学和研究评量架构之中。而大学也警告学生说他们学位的烂表现也会影响到以后他们的就业市场上的价值。而最高阶级的奖励是受到监督的，并受到鼓励说“最上曾有更多的弹性”。学生已经时常在批评课程，提供很糟的“回馈”，因此一些大学特定举办说明会说什么是在给学生的回馈和什么时候他们会得到。事实上，一些大学已经任用了“回馈主任”去处理这些事情，而一些职员也被认为是“回馈冠军”。

这样的“竞赛游戏”活动也延伸到研究评量上。2014 年许多大学从包含了所有的人到研究评量的这个传统，转变到只包含那些有很好出版表现和影响力的研究。这样的结果让一些大学被认为是作弊，也让大学有内部的评量。今天，在到 2020 年的研究评量过程的周期里面，许多大学已经安排要去监督出版了（“产量”，以 REF 的话来说），并且利用“研究影响力管理员”，而用的文件术语相当迂回且自我设。

这些领域里的决定都是被高阶的委员会透过 email 或是座谈会所形成的。Ben Martin 教授（Sussex 大学）在评论这些发展的时候说到，“不满、犬儒、噤声的出现”是被 Times 大学的工作调查所肯认的结果，而调查发现虽然学者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有报酬的，但是 3/4 则深深的受到未来计划和高阶的领导的作为感到幻灭。调查也发现一半的学者担心那些程序为基础的评量指针重复性，也有一半的人认为他们的大学为了招收学生而降低的录取标准，而且作为个人，

他们觉得有压力去给高一点的成绩。

在这个脉络下，Warwick 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 Charles Turner 最近被认为是个“会毁了学校的问题”：大多数的资源被不必要地花费在建筑物上而非图书馆。把 20 年前只会被排在后面的课程变成数一数二的必修课。把一些主修变成很重要，但是主修本身却很难成为重要。以及无止尽的无意义的文章发表，正常的人不会想写也不会想读（The Guardian, 2016/6）。。

＞ 社会学位置的变化

社会学在英国大学里面很晚才成为一个学科的。在 1960 年代只有 3 个社会学系所或中心存在。后来则是在系所数量上有了快速的成长，然后社会学成为是大学里重要的学科。而这个快速的成长包括了高度的“开放”，而有一些人试图要建立专业的界线的。而开放的风气让社会学思想贯穿了许多的领域。然而，这样的开放也让一些领域飘到了其他学科里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工作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现在这两个学科是商学院和教育学院在负责的。

社会学其他方面已经改变了。在经过 1960 和 1970 的时候的激进转向，一些专门领域变成了独立的学科，像是犯罪学。这是个高度需要的议题，并且在跨学科的学院像是社会政策或是法学院里面教授。健康和环境领域也是社会学可以发展应用课程的地方，学生也需要这样的课程。这些改变加上研究重心转向诠释和认同，让一些人认为物质结构的权力和限制被低估了，削弱了社会学响应到当代事件的能力。

类似的问题也被现在的大学和 REF 研究议程所提出过。机械的评量指标和对于“四个三星或四星”的绩效的需要已经让出版倾向期刊文章而非书籍，以及短期的田野，好配合评量的过程。一些学者可以调整去适应，有人则放弃了。许多人已经提出了这种评量对于那种需要和田野对象建立长期关系的学者的影响。更普遍的说，REF 里面特定主题所谓的“绩效

表现”反应且影响了学科整体的地位以及在大学内被看待的方式。值得一题的是，在 2014 年，有 62 的送件包括了 1302 个者选择了“社会政策”的类别。这个比例反应了有更多的研究者转向了应用的领域。结果，该主题被强迫要去报告说“只能代表了学科的部份”。

课程的“影响”是这之中的核心。因为这套公式鼓励研究者去和外部机构合作，许多学者便相信有些重要的研究是会被排除和被给很低分数的。虽然有空间去做重要的研究（例如，环境议题），但是“影响”指针意味着偏好小规模的政策变化，导致大学必须积极鼓励学者去保守做研究。ESRC 本身就是政府仔细审查的对象，因此便把研究资金集中在大型那种必须整个大学成立一个研究团队才可以达到的计划。这个政策让小计划都被忽略了。

这些变化在过去 30 年之间转变很多。今天我们似乎到达了一个危机临界点，这提出了许多关于公共大学的问题，现在的政府政策似乎倾向成立新的私立大学，这只会进一步激化教育领域的竞争。

所有这些都提出了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给大学的未来和目的的，也是给社会学在大学中的位置的。重要的是，社会学家已经表现出很强烈对于这些改变的质疑了。John Holmwood 便是带领去强调公共大学在英国重要性的人。这么做需要另外的政策议程。而“替代的高等教育白皮书”也在 London 的一次主要会议中发行了。他指出了对于学生和研究所带来的威胁是如何透过营利的机制进到了高等教育，并且引用了 1988 年由 802 所来自世界各大学所签字的 Magna Charta Universitatum：“大学是自主的机构，必须在道德和知识上独立，不受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干预。”当现在学术自主越来越倒退的时候，这个目标显得格外的重

來信寄給 Huw Beynon <beynonh@Cardiff.ac.uk>

> 加拿大的“社会学战争”

by Neil McLaughlin, McMaster University, Canada, 和 Antony Puddephatt, Lakehead University, 加拿大



在加拿大总理Stephen Harper说不
要“commit sociology”去理解恐怖主义但
是要对恐怖主义强硬起来之后社会学家所发
放的钮扣。

在21世纪之交，许多资深学者担忧加拿大的社会学走向。Bruce Curtis和Lorna Weir认为英语的加拿大社会学“缺乏对于社会学技艺、知识品味、公共关怀的深刻认识”。作为加拿大创始的社会学家并且接近退休，¹他们担心学科的未来。Robert Brym提出了对于加拿大社会学会员的减少之忧心，²担心整体学科的健康。Neil McLaughlin透过研究更广泛的制度因素，警告“加拿大社会学的危机”，³希望产生更反身的响应，开始建立广泛包容的制度和学科视野。这样的讨论被称之为“社会学的战争”，持续到了十多年后的今天。

Pat O'Mally和Alan Hunt认为Curtis和Weir对于学科式微的担忧是在“猎巫”，设定学科的限制然后监视处罚那些可能犯规的社会学家。⁴McLaughlin的“危机”一文则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挑战前述的观点。虽然这些辩论有助于脉络化加拿大社会学，⁵不过却越来越激烈。所以，当加拿大准备要主办ISA世界大会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于这些辩论有所反思，并

且讨论那些可能对其他国家来说也很重要的议题，特别是在美国脉络之外的议题。

许多对于加拿大社会学得担忧围绕在会员的减少和国家学会的出席率降低。英语加拿大社会学年会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大会的部份，参加者来自各国不同领域。加拿大社会学会议的出席率很低，特别是资深学者都不太出席。这是学科的式微吗？⁶Jean-Philippe Warren提醒我们许多其他国家的学会也有相同的问题。以Robert Putnam的“独自打保龄球”的论点来说，Warren认为因特网增加了人们跨越地理界线的沟通机会，所以学者可以“独自做社会学”，不用参加传统形式的会议。

然而已有一些弱点的象征。在2000年代早期，当社会学仍然处于低地位的时候，不论在大学或是社会上都是式微的。许多这些议题至今还是相关的，而且可能对于其他国家的社会学来说很常见，但是在加拿大这用特殊的方式再现出来，这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和美国、英国、法国不同的关系所导致。

对于美国的知识霸权的忧心激起了1970年代和80年代加拿大化的运

>>

动。社会学家试图去开创一个更自主的加拿大社会学，透过增加加拿大的研究和本土的师资聘用。可是，这个运动也产生了对于美国社会学的负面情绪，包括了批评美国但是却忽略自己的缺点。⁷

当然还是有理由去担心加拿大本土研究的缺乏，这也是许多国家的社会学所面临的。加拿大社会学家越来越接受美国训练的博士，并且不建立本土的典范像是 John Porter 或是 Wallace Clement，然后去支持更全球导向的理论家。⁸而特殊的加拿大传统越来越被吸收到其他加入全球研究的范围里面（欧美）。

Ralph Mathews 已经努力去重建更加拿大的社会学，并且透过 Harold Innis 的“钉书针理论”，⁹这是一个重要的加拿大理论家，他认为加拿大都市的地理发展和资源经济的贸易路径是紧密结合的，开创了非常不同的地理区域和多元的文化。延伸这个框架到更新的当代关怀，对于石化产业和环保，First Nations 民族的权利，我们更了解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学传统有多特殊。然而加拿大的特殊或许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比较其他国家在面对全球化和保留地方脉络的议题的参照点。

加拿大的社会学是很年轻的学科，只在 1960 和 70 年代制度化，而且有着很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因为学科创立时是在社会和政治冲突最激烈的时候。这个“批判”的元素仍然存在，带到了政策和政治介入的走向，反对保守的政治。例如，总理 Harper 忽略对于要投入更多对于恐怖主义的研究，声称“这不是做社会学研究（commit sociology）的时机”。对加拿大社会学家来说，这是在挑战社会学的价值，让加拿大社会学社在 2015 年制作了印有“Commit Sociology”的 T 恤作为抗议。

这个加拿大长期以来的批判基础创造出了一批相当接受 Michael Burawoy 对于公共社会学之呼吁的读者和观众。¹⁰有许多加拿大社会学家表态支持，也有人认为 Burawoy 做得还不够。¹¹也有学者对公共社会学并不买账。Scott Davies 提出要“学科离婚”，就是要在社会科学和批判理论之间做个抉择。¹²加拿大的女性主义者认为 Burawoy 的呼吁忽略了私领域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是有可能一起处理重大社会议题的可能性的。¹³

而且的确，当我们从 Harper 政府的

极度保守政策转向 Justin Trudeau 的自由主义，政府介入去处理公共议题，特别是 First Nation 民族的相关议题，其机会是增加的。社会学家可以期待一个更公共的社会学在加拿大诞生，这是一个和国家有这重要关系和持续对话的领域。

当今天社会学战争继续的时候，William Carroll 最近对于学科的地位感到相当忧心，认为包括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都应该建立跨学科的研究网络，并透过批判实在论去连结起来。¹⁴事实上这篇论文得到了 2015 年加拿大社会学评论的最佳论文奖，因为它反应了底下的真实文化，许多的加拿大社会学家是倾向去拒绝僵固的学科认同和信念的。

这导致了一系列的阻碍。对于有些人来说，虽然他们接受比较开放的知识观点，但是并不愿意去放弃各自的学科优势。许多人认为最近最好的研究都打破了主流受欢迎的见解——学科是故步自封的、监视知识分子的。但是其实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分享是很有效率的。¹⁵虽然不同学科之间可能钝化知识生产，但我们也不能忽略有证据显示它们也是彼此增进的。¹⁶我想，与其在完全单一学科（过度夸张）和完全跨学科（过度理想化）之间做二择一，最好的或许是在不同学科典范之间来回辩证，承认妥协的存在，不会落入两者的极端之中。¹⁷

虽然对于学科的反思是有用的，但是那也有可能演变成修辞和意识形态的争辩，反而偏离了我们真正要重视和执行的经验社会学研究。不过也是有人研究加拿大社会学的学科本身。Rick Helmes-Hayes 最近研究了加拿大社会学在 20 世纪的神学根源，¹⁸以及 Bruce Curtis 也追溯回到更早，把社会科学连结到了 19 世纪的“国家打造”。¹⁹新的量化研究也只指出了我们外国和国内聘用师资的变化，²⁰以及我们的研究，这都显示了我们学科的认识论多元性和理论长期来的变化。²¹在过去 10 年似乎有在理论上往 Pierre Bourdieu 聚合的趋势，因为 Bourdieu 帮助搭起了英语和法语学界的桥梁。²²那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经验的辩论也很欢迎这种“社会学的社会学”主题，因为这让我们不会自恋，并且更根植于经验，建立反身性的制度。

当加拿大的“社会学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并且也导致了一些“个人的损伤”，但是总体来说是有建设性的。资

>>

深的学者已经重新进入这个场域，并且帮助年轻的学者可以进到正面的视野里面。而参加我们会议的人数一直增加之中，这也让各种研究群体蓬勃发展，部份也是受到了ISA的影响。而且有更多的法语场次，而加拿大社会学评论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的主编 François Dépelteau 就是说法语的。总之，我们的学会也有强韧的女性主义社会学，主要是被 Dorothy Smith 和其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所激发的。此外，新的研究纲领也主要在去殖民和肯认，还有 First Nations 的原住民群体也拓展了许多需要且和公共社会学相关的议题。

加拿大社会学会期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学家到2018年的ISA世界大会。我们期待去增进彼此的对话和理解，以及反思我们多元的全球社会学，也期待可以在比较的脉络中相互学习，成长。■

來信寄給 Neil McLaughlin <ngmclaughlin@gmail.com>

注 1 : Curtis, B. and Weir, L. (2002) "The Succession Question in English Canadian Sociology." *Society/Société*, 26, 3.

注 2 : Brym, R. (2003) "The Decline of the Canadia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8(3): 411-416.

注 3 : McLaughlin, N. (2005) "Canada's Impossible Science: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Coming Crisis in Anglo-Canadian Sociolog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0(1): 1-40.

注 4 : O' Malley, P. and Hunt, A. (2013) "Does Sociology Need to be Disciplined?" *Society/Société*, 27(1).

注 5 : See volumes 30(4) and 31(1) in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for the main comments on McLaughlin's "crisis" article, and his reply (2005-06).

注 6 : Warren, J-P (2006) "Sociologizing Alone? Is Anglo-Canadian Sociology really Facing a Crisis?"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1(3): 91-105.

注 7 : Cormier, J. (2002) "Nationalism, Activism, and Canadian Sociolog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33(1): 12-41.

注 8 : Warren, J-P (2014) "The end of National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The Fates of Sociology in English Canada and French Quebec in a Globalized Field of Sc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50: 87-108.

注 9 : Mathews, R. (2014) "Committing Canadian Sociology: Developing a Canadian Sociology and a Sociology of Canada."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51(2): 107-127.

注 10 : Burawoy, M. (2005) "2004 Presidential Address: For Public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 4-28.

注 11 : See a special issue on this, edited by Rick Helmes-Hayes, and Neil McLaughlin (2009) "Public Sociology in Canada: Debates,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Context."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4(3): 573-600.

注 12 : Davies, S. (2009) "Drifting Apart?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awaiting Public Sociology in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4(3): 623-654.

注 13 : Creese, G., McLaren, A. and Pulkingham, J. (2009) "Re-thinking Burawoy: Reflections from Canadian Feminist Sociolog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4(3): 601-622.

注 14 : Carroll, W. (2013) "Discipline, Field, Nexus: Re-visioning Sociology."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50(1): 1-26.

注 15 : Jacobs, J. (2013) *In Defense of Disciplin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注 16 : Curtis, B. (2016) "The Missing Memory of Canadian Sociology: Reflexiv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al Science."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53(2): 203-225.

注 17 : Puddephatt, A. and McLaughlin, N. (2015) "Critical Nexus or Pluralist Discipline? Institutional Ambivalence and the Future of Canadian Sociology."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52(3): 310-332.

注 18 : Helmes-Hayes, R. (2016) "Building the New Jerusalem in Canada's Green and Pleasant Land: The Social Gospel and the Roots of English-Language Academic Sociology in Canada, 1889-1921."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1(1): 1-52.

注 19 : Curtis, B. (2016), *ibid*.

注 20 : Warren, J-P (2014), *ibid*.

注 21 : See Joseph Michalski, "The Epistemological Diversity of Canadian Sociology." *Forthcoming in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注 22 : Stokes, A. and McLevey, J. (2016) "From Porter to Bourdieu: The Evolving Specialist Structure of English Canadian Sociology."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53(2): 176-202.

> 回忆 John Urry 及其研究



John Urry.

你认识一个人很久以后，其实是很难把那个人和其研究分开来看的，而且或许也最好不要这样做。John Urry 对于社会科学的贡献不仅仅是透过发表，还透过了其人其行，为我们立下了典范。

他的例子告诉了我们，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研究者或是老师，其实没有必要宰制，也没有必要树立一种让人“敬畏”的人格或是艰涩的写作风格。他总是对于名利毫不在乎，并且其幽默总是存在于其批判的心智和对于研究的高超品味。他比较有兴趣去立，而不是破。他虽然批判，但是不吝涩。他可以用让人接受的方式表达出他不同意的地方，而且不拐弯抹角，他总是鼓励年轻人加入其知识追求的旅程，然后找出自己的独特方向。

John 喜爱学期，在社会学种很热切地开创新主题和新的思考方式，像是空间、时间、解组资本主义，观光，自然、流动、气候变迁，或是更特别的主题如 3D 打印。他对于忠诚于社会学始祖这种事情并不感兴趣，但也对于各种理论概念抱持包容开放的胸襟。他有独到的慧眼可以看到其他主流学者忽略的事情，像是观光、多重流动、或是外包 (off-shoring)。

我在这篇短文中没办法回顾他这些主题，所以我只会评论两个时期：早期和晚期。我

>>

首先接触到他的作品是 70 年代中期，那时我们的兴趣是批判实在论、政治经济学、社会理论和空间收敛。John 则另外一边进入，那就是地理学。Gregory 和 Urry 的《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探讨了这两者的意义。晚期则继续重新思考空间和社会的关系，这特别在其多重地方性 (localities)，多重流动性 (mobilities)，外包 (offshoring) 等研究中可以看到。

在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早期，许多英国社会科学都被马克思主义所激进化，而 John 则是其中一个那些研究这些概念但是保持心胸开放、非教条的学者。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会议则聚焦给了激进研究与讨论，涵盖广泛的议题，每周的研讨会带来了不同的研究者和运动者，来自世界各国。这就是其中之一我遇到 John 的场合 (CSE 地方主义团体)。所谓 Lancaster 地方主义群体是几个英国研究群组中的一个，并且是用激进的理论去研

究的。那些所谓的“地方性研究”是被用来对抗资本主义变迁之辩论的，那时候大家称当时是后福特主义。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后者是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化发展的一个岔路，John 和其同事 Scott Lash 结合了理论和经验的取径，研究资本主义的各种面向和变迁，可见《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and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一书。

在他最后的 5 年内，John 发表了 3 本书，探讨了一系列的气候变迁，资源，社会的群组议题。他们包括了《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Societies Beyond Oil》，和《Offshoring》。像是 Scott Lash 所说的，John 总是对于社会未来特别有兴趣，而最近他也帮助成立了 Lancaster 大学的社会未来研究院。

气候变迁毫无疑问是人类社会当今最大的挑战。虽然最近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的辩论没有提到全球暖化，但是 John 是其中一位先驱的社会科学家

提出石化在现代性发展中的影响，并且透过仔细思考一些气候变迁的意义和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虽然我们多数人透过历史去往前看，但是 John 是向前看的。其他的世界，不论好或坏，都有可能，而且像是他显示的，社会科学家可以也应该透彻思考和评量这些议题。在这个不稳定的危险时代，我希望更多人跟着 John 的脚步向前走。■

—Andrew Sayer,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国

> John Urry

未来的社会学家



社会未来研究院的会议，Lancaster，2015。

过世的 John Urry 是英国被引用最多的学者，有 20 多本书，许多都很有影响力。在从 Cambridge 大学毕业之后，John 在 Lancaster 大学待了一辈子。我们在那里从 1977-98 成为同事。我们合写了两本书：《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1987) 和《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1994)。两本书都关于未来，所以很多方面来说，John 是个未来学家。

作为 PhD 学生，John 和 Bob Jessop 都上过 John Dunn 在 Cambridge 的革命讨论课。那个讨论课也被 Quentin Skinner 所影响，而他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 Hobbes 学者。革命的末世论调总是面向未来的，而 Hobbes 则多关于国家权力。或许这些影响一革命和国家一给了 John 一种关于国家权力的现实感。

1975 年的时候，John 和

Russell Keat 写了《Social Theory as Science》一书，这是一本在“实在论”框架下讨论认识论的一本书。“实在”并不是社会行动者所遇得到的。反之，实在是深层的结构，并且有办法决定经验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被阿图赛 70 年代的马克思结构主义所影响的社会学结构主义。但是马克思结构主义总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Urry 的结构主义则比较属于普遍的社会结构，包括了结构因果性，不仅决定了经验的社会关系，也开启了社会变迁和未来的可能关系。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and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一书常被引用且喜爱，并且影响了 David Harvey 和 Manuel Castells。该书讨论了资本积累，但是论证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不再被社会制度和组织所控制，反而是被社会解组所掌控。John 和我从不同的观点一起做

出了这个论证。

我从中央集体议价的消解（工会和雇主会）去论证资本主义的解组。John 则看到了后 1980 年代的资本主义更像是运动或流动，并且已时间的角度来说，既非导向过去，也不是现在。反之，是面向未来。因此该书包括了 John 所写的章节谈论时间和人们关系的移动。这个论证后来成为了 John 的书：《The Tourist Gaze》，这是观光社会学的开始。

80 年代晚期 John 和 Derek Gregory 编辑了《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主要的作者之一是 Doreen Massey 和其“再结构”的概念，包括了“价值炼”的转面。例如，价值炼会追溯商品的源头，像是南美的主要原物料，并且看其在墨西哥工厂里的转变过程，然后如何被送到欧洲或美国的市场。这些价值炼是“延伸的”，他

们在时空上连结了很远的地方。这些就是 Giddens 所称“时空距离化”或是 Harvey 的“时空压缩”的经验例证。

这就是全球流动社会学的更完整版，我和 John 在《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一书中处理的就是这个。Castells 已经开始处理从前社会结构到新全球社会的流动，包括各种流动，资本、劳动力、商品、环境污染，或是信息沟通的坏东西。

John 发展出了“流动性社会学”，是其 90 年代晚期到后来研究和写作的重心。他后来特别对于人如何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感到兴趣，像是观光，但是他所有对流动性的研究都包括了一章关于汽车流动性 (automobilities) 的研究。我们从汽车看到了这个世

界，并从科技的角度来理解。

John 后来写了一系列关于气候变迁的书，回到了那些“坏事”的 mobilities 或是流动的主题，这是一个和 John 的政治左转同时发生的事情。我其实早期比 John 还左，但是他到了 2010 之后强烈的批判资本主义。譬如在他的书《Offshoring》中可以清楚看到。我记得有一次是英国研究委员会的会议，在上海举办，有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受邀，在场一位有名的法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气候变迁的怀疑者，John 已经 60 多岁了，但是仍神采奕奕地和这位 25 岁的年轻学者杠上激辩。

John 是一个未来的社会学家。我遇到他的时候我们都大概是 30 岁的时候。我们在接下来的 21 年内当了同事，

且是一辈子的好友。Sylvia Walby 是 John 的另一半，说过 John 相当聪明，而且精力无限。我欠 John 所为他的充沛精力所作的一些节制。我想念他，而我们也都会想念他。■

— Scott Lash,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英国

> John Urry

不只是社会学家的社会学家



低碳排放创意论坛，深圳，中国，2016。

John Urry 突然的过世让其家人、朋友、同事惊讶不已。他和我一开始是在 Cambridge 大学的研究所中认识的 (1967-1970)，我们分享了许多兴趣，也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会议中互动很多，也在社会学圈中交手多次。我们在 1990 年变成了同事，那时我成为了 Lancaster 大学的社会系主任。

John Urry 从 Christs' 学院 (Cambridge) 得到经济学和政治学双学位。那时他是由 James Mead 所指导，他是一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在那几年中 John Maynard Keynes 的研究仍被当成主流，而其他的经济学仍然属于政治经济学。John 后来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系中读博士（那时没有社会和政治科学的老师），处理的问题是相对剥夺和革命，由英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 (SSRC) 会奖学金所支持。这是在 Sir Keith Joseph 之前，也就是詹气尔夫人鹰派教育与科学的大臣，他看轻鄙视社会学，以及家庭贫穷的相对剥夺理论为剑，提议 SSRC 改名叫做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几年后，John 成为了社会学群的首席教授 (1988-92)，为社会科学大力辩护。1999 年，他帮助成立了英国的 National Academy of Academics, Learned Societies and Practitioners in the Social Sciences（改名为中央社会科学研究院）。

在 1970 年，也是他博士学位取得之前，John 开始担任 Lancaster 的社会学讲师。在 46 年的生涯中，他贡献给了该系所一个强韧的研

究文化，并且透过其作品和制度的建立而得以可能。从“科技革命”的大洪流以来，以其 70 年代的左派思潮，大学已经变了很多，对于学者的要求也增加了。但是 John 总是可以维持其对学习的热爱，其对于社会变迁的好奇心、享受追求知识的热情，这些都结合到了其思考之中，不论是权力、社会理论、空间、时间、地方主义、地域主义、解组的资本主义、休闲和观光、自然和环境、mobilities、全球社会的复杂度、能源使用和气候变迁、都市设计、3-D 打印的社会影响，以及最近的未来的未来等等。许多这些兴趣都在其社会未来研究所里面被实现。

Scott Lash 和 Andrew Sayer 在其文章中已经描述了 John 的生活和研究。我想我最爱 John 的作品是他严谨和全面的《Social Theory as Science》，这本书是和 Russell Keat (1975, 2015 再版) 一起写的。这不仅巩固了他的理论轨迹而且也启发了在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然而，John 总是对于理论和经验的辩论保持敏锐，广泛地诘问知识的贡献、新的观点、或是不寻常的点，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他的兴趣很广，包括了连结到了自然和环境科学，有着很强的“后学科”取向，也是 Lancaster 社会学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他有办法可以在学科、典范、认识论之间游走，可以和许多学者对话，鼓励他们去追求他们的兴趣和研究，并且提供看法，在这个知识的能力基础上，这

些互动有办法更新和拓展开来。

有许多方式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社会学家。John 擅长于多数的这些方法。但是他从来不追求名位，并且基于其知识分子的精神而对权力敬谢不敏。他总是抱持批判性，也总是为同事和学生提供热情的支持。可是，持续 Alvin Gouldner 对于组织认同的区分的话，他则是一个“普世主义”者，有着全球知识的贡献。他的兴趣和研究拓展到的自然和社会的世界，而影响可谓无远弗届。

John 是社会学家的社会学家，因为他知道和尊敬社会学的技艺，并且致力于发展之。他被认为是具有前瞻性的创意的人，也致力保护这个学科免于受到政治的迫害。而且他有强韧的知识分子精神，这和一般的专业社会学家总是局限在很狭小的领域中不同。他总是有无限的好奇心，把很多不同的领域结合在一起，并且刺激了许多新的领域的发展和政策辩论。的确，他是在这个学科的前沿工作的，不论是理论和经验上的是如此，所以很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可以完成那么多成就，包括自己的研究，合作的，国际的，还有研究管理，并且和审查者之间的谈判，以及为社会科学的推动而奔走。也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这么多产的情况下还可以保持慷慨、随和、和幽默。

John 也有一个英雄般的心灵与信念，像是 C. Wright Mills (1959 年“社会学想象”一文的作者)。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说真话

是需要冒着风险的，因为有可能会错。但最近几年他变成了公共知识分子，介入许多关于社会和地球的议题的辩论。总是，他是很棒的同事，而他的影响则会永远持续下去。■

- Bob Jessop,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国

> 邻近与流动

纪念 John Urry



“未来的城市：聪明或幸福？”会议，Lancaster, 2016。

英国社会学家 John Urry 在 3 月的时候过世。那时，我们其实才正在庆祝我们一起写的文章“推动新的社会流动典范”发表在期刊《Applied Mobilities》。这篇文章我们主要是评估社会流动典范在社会科学过去十年的影响，我们也才正在写一篇文章，讨论“流动转向”和“空间转向”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有机会可以和 John 讨论这两个主题以及与社会学的关系。

我在 1998 年加入 Lancaster 的社会学系，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John 在那里。John 有办法吸引到许多研究

生、博士后、访问学者、新进教师到西北英格兰的能力，所以形成了一个很成够的跨学科研究环境。在写了许多 mobilities 相关的文章之后，我们一起于 2003 年在 Lancaster 成立了流动研究中心。而接下来的几年，我们也举办了另类流动研究的未来研讨会，并和 Kevin Hannam 设立了期刊 Mobilities，也一起编辑了《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的特辑：“materialities and mobilities”，还有《Mobile Technologies of the City》。这些基础之上，我们强调跨越空间的思考，模糊学科边界，探讨物质性和时间性，并且超越国族和社会的架构，研究“mobilities”如

何为一个更开放、广大、包容、生动的社会科学做出贡献。

我也很感激的是，最近的对话中，John 回顾他对于流动的兴趣如何根植于社会理论中的空间转向，主要是从 Lefebvre 的 1947 年的《La production de l'espace》，以及英国由思想家 Doreen Massey 所发起的辩论（也很不幸地最近过世了）。Massey 的 1984 年的书《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是探讨复杂多变得资本运动如何形塑改变了空间结构。这本书是在 Gregory 和 Urry 的 1985 年的《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这本书综合了 Harvey, Giddens,

Massey, Pred, Sayer, Soja 和 Thrift 的贡献，并启发了 John 的所谓“人们进出空间的休闲”的转向，并在《The Tourist Gaze》(1990) 一书中有所阐释。另外，多重流动和其空间的结果也在 Lash 和 Urry 的《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1987) 和《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1994) 书中有所讨论。John 早期著作《Social Theory as Science》(1975, with Russell Keat) 和《The Anatom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1981) 也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为他后来的研究奠定的基础。1990 年代中期，Castell 的 1996 三部曲，网络社会让空间的流动和网络等概念的理论化成为显学，而 mobility 也变成了关键词。

John 的《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帮助后来的 mobilities 成为空间社会学或是“流动社会学”中的主要概念，这是一个在过去 15 年来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取径，至少在美国以外是如此。

这个转向强调 mobilities 的趋势和期刊“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and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由 Polity Press 于 1980 年的出版是同期兴起的。John 称这个期刊是 Thatcher 政府对于大学和缩减社会科学的政策响应，然后试图去发展后学科划分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

John 也描述自己的研究是关于美国社会科学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对抗。照我看来，在美国，John 的这种反实证主义的批判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社会学会和许多主流社会学系所并不情愿去纳入这种新的 mobilities 典范，但我觉得这个典范是批判理论和后学科划分的社会科学的一道未来的曙光。

尽管这个“新典范”的宣称或许有点过于自信，但是 John 本人是很谦虚的，从来没有炫耀自己的成就。John 的个人立场是完全反对精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他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可以看到，从他的穿著总是蓝色上衣，蓝色夹克，蓝色裤子，然后总是没有打领带。他是个平等主义者，对于炫耀、阶级、地位等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欢迎世界各地来的学生，总是笑容以待，并且总

是让那些学生有容身之处。

John Urry 开启了一种新的流动社会学典范：这个典范超越了学科边界，让新的知识得以形成，并且让社会学可以透过探讨重要公共议题去更新期对于这个社会的相关性，这个努力包括他最近讨论气候变迁，资源榨取，黑暗经济等议题。新的流动典范和 Urry 的研究继续站在美国和英国量化研究的对立面，并切对抗学术体制的阶层、专业化、还有新自由主义大学导向。社会学将会站在他的肩膀上继续奋战。

—Mimi Sheller, Drexel University, 美国

> 学生运动反对性暴力

by Ana Vidu,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ISA 经济与
社会委员会 (RC02), Tinka Schubert, Loyola Uni-
versity Andalusia, ISA 女性与社会委员会 (RC32)¹



Arbu绘图。

California 大学 Berkeley 分校长期以来对于性骚扰和性侵害的辩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不只是因为其类似事件有着不寻常的数字，也是由于该校响应的方式的缘故。很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在多数大学里面普遍存在着，Berkeley 大学作为许多大学处理该问题的学校之一，其对抗性骚扰的学生动员是相当有名的，这种学生运动也已经在其他学校开始了。

Berkeley 分校的反对性别暴力的学运扮演的是先驱的角色。这个议题主要首先在 70 年代晚期开始出现，当时社会系学生组成的女性反性骚扰组织 (WOASH)，这群女性代表了 13 个女学生对于一位社会系教授的控诉。这个事件为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性别暴力议题打破了沉默，而且也反校园性骚扰的运动开启了第一个先

例。

1979 年由 WOASH 所发起的联邦控诉案让大学采用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作为防治性骚扰的架构。但是 WOASH 并没有因此停止。2 年之后，其开启了第一个给新进学生的校园导览，让新进学生知道如何面对和处理校园性骚扰，然后也提供受害者咨询和协助。

1990 年之前，申诉的数量、政策数量、给受害着的资源数量、处理性骚扰案件的单位的数量都有了显著的增加。2003 年，“No means no”被引进到“犯罪性骚扰法案”，为的是去成立“同意”必须是性行为的前提。

在 2010 年代早期，学生运动者申诉，认为大学并没有认真处理投诉案件，违反了 Title

>>

IX。这个申诉对象是所有的美国大学无法保护学生免于受到性骚扰。2013年，California 议会要求 Berkeley 重新检视性处理别暴力的相关政策。一年后，也就是2014年，学生推动“*Yes means Yes*”的同意法案，要求性关系中必须要有“确认、有意识、自愿的同意”，认为受害者其实很难总是有办法说出“no”的。

2015年，学生运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开启了团结的脉络和校园社群的支持，并鼓励了大学师生去反对性别暴力。最近，从教师和系所而来的压力 Berkeley 一位太空学的诺贝尔奖教授因为多年前的性骚扰案例而被迫辞职。在那之后，学校成立了委员会专门处理教师被投诉性骚扰的案件。

美国校园反对性暴力的抗争包括了社会动员和法律变革。WOASH 的1979年抗议的重要性在于开启了脉络，发声，然后提出法律诉讼。这些抗议也帮助改变了校园文化，唤起意识，开创了尊重的校园文化和对校园性骚扰的零容忍。现在，校园性骚扰已经广泛被认为是问题了，这改变让受害者可以从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得到支持。

学生运动者持续去挑战和改善 Berkeley 校园的政策，让大家可以看见，像是在校园入口，学生可以发表其担心的问题。甚至在去 Berkeley 的巴士上也可以听到大家讨论此议题。校园中，学生抗议的身影也常出现，还有印有相关字样的衬衫反对性别暴力，以及性骚扰议题的课程也已成为常态。学生报纸也会刊登最新的性别暴力新闻在头版。

在美国，反对性骚扰的运动已经兴起许久，不论是全国或是地方会议，或是全国性的组织，都已经颇有规模。一个知名的运动是“终结校园强暴”，是由被害者和运动者所组成。其他还包括了 California 电视节目“审视性骚扰”。有一部纪录片叫做“狩猎场”。一部小说叫做“一次又一次”。而美国政府则成立了一个网站叫做“你不孤单，一起反对性骚扰”，提供资源、数据、法律、信息给学校、学生、和所有关心该议题的人。而白宫和国家校园领袖委员会推动了“*It's on US*”运动去唤起意识，去防治这个国家层级的问题。政府称要去“采取行动”，不袖手旁观，而要解决问题。“*It's on US*”主要目标是去改变性骚扰的校园文化，然后提供资源给受害者。

那些由 Berkeley 学生和其他大学所采取的行动不只改变了制度对于性骚扰的响应，也影响了学生的全球动员。如前所述，被害者强大的团结网络是最关键的，也将会加速这个运动的进展。例如，在西班牙，尽管官方的漠视和加害者的报复，学生运动在过去几年已经发展了起来。“校园性暴力受害者网络”推动了西

班牙校园内的学生运动。可是，至今还是只有很少的教师参与，若是参与，会被报复。该网络是由运动者和受害者一次对于一位教授的性骚扰所提出的控告而开始的，而面对制度的忽视，这些人决定要动员自己，联络媒体，并成为其他受害者的支持网络。该网络行动被西班牙的健康、社会、平等部门视为是最佳的实践。

美国的性别暴力社会运动和学生运动在西班牙和其它国家的校园内响应了起来。这样的运动伴随着公众的支持，将会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校园。■

來信寄給 Ana Vidu <ana.vidu@ub.edu>
和 Tinka Schubert <tschubert@ub.edu>

注1：这篇文章的研究执行于 Ana Vidu 访问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和 Tinka Schubert 访问 Graduate Center of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期间。

> Mondragon 的第三条路

回应 Sharryn Kasmir

by Ignacio Santa Cruz Ayo,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西班牙, Eva Alonso,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西班牙



Mondragon镇上的壁画。Christian Weber 摄影。

Mondragon 已经成为资本工厂，工作环境恶劣。这个批评总是包含两个元素：第一，临时工的大量增加和非合作社子公司的全球扩张。这篇文章中，我们则提供一些数据，要说明：和放弃合作社的原则刚好相反，Mondragon 的成员把这些挑战视为是强化和增进期运作模式的机会。我们的研究指出了合作社的第三条路，这条路也是非资本竞争模式的第三条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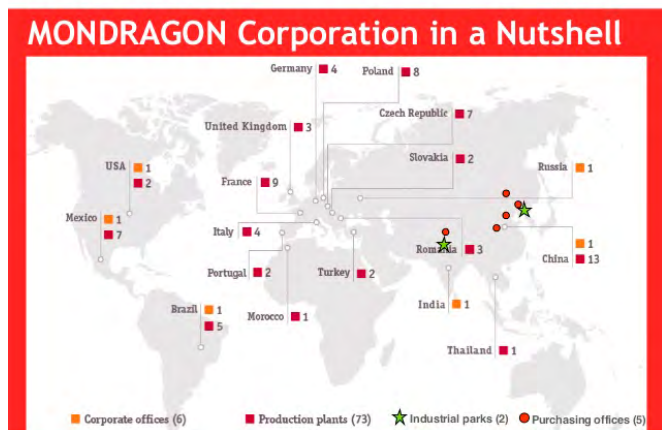
超过 60 年来，Mondragon 开创的工作的质量和持续一直是主要目标。其 2014 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 Mondragon 有 263 个组织，包括 103 个合作社和 125 家生子公司。加起来看，Mondragon 总共有 74117 个工作。历史上来看，Mondragon 是可以在经济萧条时期开创就业机会和持续保有质量的，可以的话，许多还是永久的工作。今天有许多的非合作社工作则可以在三个领域中找到：分配部门，西班牙企业子公司，国际企业子公司。

Mondragon 使用三个策略去将临时工转变成合作社工人。在分配部门，Mondragon 使用 EMES 计划 (Estatuto Marco de la Estructura Societaria)。其分配部门的子公司 Eroski 吸收了另外一个资公司 Caprabo，然后结合两者个超市。2009 年 Eroski General Assembly 实行了 EMES 计划，其工人都有机会成为合作社工人。虽然这个计划还在执行，但是 Eroski 则处于艰难状态，亏损连连，现在则在内部重组和减少债务。所以这个领域不是一个很好把临时工转变成合作社工人的地方。

第二个策略包括了把企业子公司转变成混合型合作社，让工人可以成为合作社成员。这个计划唯有在子公司可以行的情况下才得以可能。另外，这也要合作社和资公司的工人都

作为研究合作社的学者，我们想要谢谢《全球对话》所开启对于合作社的辩论，并且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响应 6.1 期 Sharryn Kasmir 对于 Mondragon Cooperative 的评论。

批评者对于合作社，特别是西班牙知名的 Mondragon 合作社的批评通常这么讲：“在面对竞争之后，合作社会惰落成资本家，或是资本家的资助者。” Mondragon 很清楚的并不是资助者，但是许多包括 Kasmir 在内批评者则是认为



Mondragon 合作社的全球布局。

有意愿才行。这案例发生过几次：Maier Ferroplast Limited which belonged to Maier Cooperative Society (2012); the Victorio Luzuriaga Usurbil cooperative (2004); Fit Automotive (2006); 和 Victorio Luzuriaga Tafalla cooperative (2008)。这些案例都并非特殊或罕见案例。

第三的策略是关于 Basque Country 之外的子公司。Mondragon 已经成立了许多国际子公司去帮助母公司工作的质量和稳定。从这点来看，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因为海外公司甚至开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许多批评者见解相反的是，数据显示了有越来越多任务人成为合作社成员。Altuna (2008) 指出，2007 年成员占了 29.5%，但是 2012 年则增加到了 40.3%。

2003 年，Mondragon 的第八议会决定该公司的主要目标是扩大合作社价值，推动参与（管理、资本、获利），透过延伸企业管理模式到 Mondragon 的国际子公司。虽然这项努力开始了，但是还有很多障碍。这些公司的合作社转型包括了许多经济、法律、文化、投资等的障碍 (Flecha and Ngai, 2015)。例如，许多国家的法律架构并没有承认合作社，许多工人没有资源成为合作社成员，而在许多子工厂。许多工人并不了解合作社。(Flecha and Ngai, 2015) 的文化在 Basque Country 的兴起经过的 60 年，世代相传才得以可能。不过，也是有成功的案例。例如，Angel Errasti (2014) 描述了把工会代表结合到波兰 Fagor Electrodomesticos 的资公司的管理议会之中，这代表了工人参与的成功案例。

Mondragon 提出了许多复杂的问题，包括了合作社的角色如何对应到竞争的资本经济体系之中。Mondragon 的合作社是必须在竞争的环境下生存的，所以若是不走向国际，那么就会丧失开创更多工作的机会。虽然合作社是少数，

而资本家设定了游戏规则。但这并不表示资本主义是唯一的全球经济选项。Mondragon 已经告诉了我们合作社也可以国际化。当子公司成立在国外之后，Mondragon 会优先去包住在当地合作社的工作，而不是把工作移到海外。

Mondragon 已经成功地维持了比其他合作社或是资本厂较好的工作环境。这点，就连那些对于 Mondragon 的批评者也是承认的，而且合作社成员也都希望那些资公司的工人能拥有好的工作环境。这个开创高质量和永续的工作的原则也被应用到国际的子公司。因此 Luzarraga and Irizar (2012) 显示，除了遵照国家和在地的管制，Mondragon 的资公司已经改善了工作条件，像是工资和训练。虽然 Mondragon 的合作社运动无法独自打败全球资本主义，但是它会负起历史的责任，为其员工开创一个更好的世界。

來信寄給 Santa Cruz Ayo <Inaki.SantaCruz@uab.cat>

和 Eva Alonso <eva.alonso@ub.edu>

References

- Altuna, L. (ed.) (2008) La Experiencia Cooperativa de Mondragón, Una síntesis general. Eskoriatza: Lanki—Huhezi, Mondragon Unibertsitatea.
- Errasti, A. (2014) Tensiones y oportunidades en las multinacionales cooperativas de Mondragón: el caso Fagor Electrodomesticos, Sdad. Coop. Revesco: Revista de Estudios Cooperativos, 113: 30-60.
- Flecha, R. and Ngai, P. (2015) The challenge for Mondragon: Searching for the cooperative values in tim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rganization, 21 (5): 666-682.
- Kasmir, S. (March 2016) The Mondragon Cooperatives: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Global Dialogue 6.1.
- Luzarraga, J.M. and Irizar, I. (2012) La estrategia de multilocalización internacional de la Corporación Mondragón. Ekonomiaz, 79: 114-145.

> 《全球对话》 的罗马尼亚翻译团队

by Costinel Anuta, Corina Bragaru, Anca Mihai, Oana Negrea, Ion Daniel Popa, 和 Diana Tihan,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罗马尼亚



《全球对话》的罗马尼亚翻译的挑战。

这篇文章描述《全球对话》罗马尼亚翻译团队的诞生和组成，并且着重在发展和工作的过程，以及团队的特殊之处。

罗马尼亚编辑团队一开始是由 Marian Preda 教授所带领的研究生团队所组成，是其训练博士生的一部分，还有 Cosima Rughiniș 教授和 Ileana-Cinziana Surdu 教授帮助了整个过程。Ileana 领导了整个团队的每一步，为

现在的运作模式奠定了基础。

在接到了《全球对话》的英文版之后，团队会寄邀请信给团队成员和 Bucharest 大学的社会学研究生。而最吸引人的动机是可以提供社会学阅读和翻译的实际训练和实做经验，另外还有给那些已经翻译五期以上的人 ISA 免费学生会会员的优惠。

在英文版文章放到 Dropbox 上之后，文章

>>

会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内被翻译出来，每一位翻译者会负责一定数量，大概4到10页不等，依每期的状况而定。第三周包括了相互审稿，每一位翻译者校稿其他文章，并且英文和罗马尼亚文的文章会一起比较，是为了要可以传达原稿的原意和风格。第四周由一位新的成员校阅每一篇文章，要去让文章之间可以兼容（像是引用格式，以及同义词的选择），然后最后，团队整个编辑和校阅罗马尼亚版。

当然事情不总是像上述那么顺利，每个成员还是要去学习社会技巧，像是耐心和容忍。最棘手的挑战是把英文翻译成通畅自然的罗马尼亚文。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去创造兼容的词汇去翻译那些新的概念，像是在5.4期中出现过的“trickle-down”经济，这个挑战是因为英文（日耳曼语系）和罗马尼亚文（拉丁语系）结构上的差异所导致，譬如两种语言会用完全不同的文法和文字顺序。过程中常会出现对于翻译上的激烈辩论，但这是很好的机会去让我们翻译得更好。有些时候我们会找不到对应的翻译，不过当有人提出证据证明之前已经被翻译过了以后，大家就会停止争辩。因此翻译的挑战以两种方式帮助了我们的团队：它增进了我们的语言流畅度和对社会学知识的了解。不过为了在截止日期完成翻译，团队必须在各自

的工作和翻译之间找到平衡，这是另外一个挑战。

《全球对话》涵盖的各种主题，我们的团队也需要在学术和在地的文化之中去来回碰撞。透过整个翻译的过程，每一位成员的热情、兴趣、决心，让罗马尼亚的翻译更加专业。■

來信寄給

Costinel Anuța <costinel.anuta@gmail.com>

Corina Brăgaru <bragaru_corina@yahoo.com>

Anca Mihai <anca.mihai07@gmail.com>

Oana Negrea <oana.elena.negrea@gmail.com>

Ion Daniel Popa <iondanielpopa@yahoo.com>

Diana Tihan <tihandiana@yahoo.com>